

JINDAISHI
YANJIU

近代史研究

5

1986

鸦片战争前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文化活动

邹 明 德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并非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而是发端于十九世纪初叶。其标志就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东来和他们在华从事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活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初阶段始于一八〇七年英国伦敦布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 Morrison)来华至鸦片战争前夕凡三十年，这一时期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既扮演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要是英国）侵略中国的吹鼓手和帮凶的可耻角色，同时又不自觉地担负起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责任。本文所要讨论的不是传教士来华的真实动机或他们和这一时期远东国际关系有何联系，而是他们的文化活动在客观上所起的某些作用。

(一)

鸦片战争以前基督教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就其内容而言，大致集中在教育、出版和新闻诸方面。

基督教传教士的文化事业在教育方面是起了开拓作用的，其中最著名的首推马礼逊和米怜(W. Milne)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英华书院于一八一八年奠基兴建，一八二〇年招生入学到鸦片战争结束后迁往香港的二十年间，共有中外学生数百名就读于该校，其中绝大部分为中国学生，但真正在英华书院完成学业的学生仅为数十名。英华书院的教工绝大部分是西方传教士，但也有些中国人参加学校的教学工

作，有名可考的是朱进(Choo-tsing的谐音)^①，另一位曾任马礼逊中文教师的李先生。他们的教学任务为教授中文和中国经典。

传教士兴建学校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进上帝的事业”^②，使之成为“一种直接地或间接地使每个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工具”^③。但在米怜起草的英华书院章程中并没有明文载入强迫学生接受基督教的规定^④。建立英华书院的目的是：一、向中国学生“既教授中国的知识，又教授欧洲的知识”；二、向东来的欧美人提供学习中国语文和有关中国知识的场所，让他们初步了解中国社会和掌握中国语言^⑤。他们首先在教会学校中开设《圣经》、自然神学和天启神学之类的宗教课程，也安排历史学、地理学、数学、几何学、逻辑学、伦理学、天文学等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⑥。在所有的课程中，传教士最强调和注重的是外国语言的教学。学生每天早礼拜时，必须练习将英文《旧约》的某些章节回译，或朗读英文《新约》。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也突出此点。学生每天都需根据教师的讲课内容作文一篇，课后尚有大量的中英对译的作业^⑦。在教学方法上，英华书院也一扫中国封建私塾死读硬背，不求甚解，模仿作文的旧习。学生按其知识程度的高低分班，并由教师根据学生的情况编纂教材，分别讲授，选用的教材也按程度依次递进，如《缀字课本》(Spelling Book)、《英文讲义》第一至第二册、《历史》、《地理》等，教学内容也是多样化的。这种内容广泛的教育和鼓励学生创新的方法无疑有助于学生智力的发展，也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在近代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传教士所作出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贡献莫过于马礼逊翻译的《圣经》全本和编纂《华英辞典》。《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的经典，同时又是世界文学巨著之一和今天史学界研究古代阿拉伯各国历史的资料。在马礼逊之前，曾有人试图将《圣经》译成中文。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的一本《圣经》手抄本包括《四福音书》、《使徒行传》等内容^⑧，就其

译文均选自《新约》来看，恐怕不是明末清初之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所为。马礼逊从一八〇八年着手翻译《圣经》^⑩，到一八一三年译毕《新约》，而后与米怜合作从事《旧约》的翻译直到一八一九年完成，整个《圣经》翻译工作持续十余年之久。以个人的努力将这一巨著介绍到中国来，其精神和毅力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而且产生的意义也远远超越这一工作本身。以后，马礼逊将《新约》和《旧约》合并，成为一部完整的中文《圣经》，定名《神天圣书》，一八二三年在马六甲按照中国古书的格式印刷，分二十一卷出版^⑪。

马礼逊编纂《华英辞典》的工作几乎与翻译《圣经》同时开始^⑫，并由他独力完成。全书三卷四册，共四千五百九十五页。第一卷按中文部首排列，辅以英文释文，中文篇名为《字典》，一八一五年在澳门印刷出版。第二卷共收中文词四万条，以音节为序，中文篇名为《五车韵府》，一八一九年在澳门出版。这二卷编纂的基础是《康熙字典》。第一卷的编排方法和字数与《康熙字典》完全相同^⑬，第二卷也参照了《康熙字典》。第三卷共二册，为英汉对照，中文篇名与第一卷相同，第一册于一八二三年在澳门出版，第二册于一八二二年在伦敦刊印。《华英辞典》的编纂和出版对以后中外文化的沟通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除《华英辞典》外，传教士在这一时期还编纂刊印了各类中英文的中国方言辞典。其中较著名的有马礼逊于一八二八年完成的三卷八开本的《广东省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在澳门印行。该书第一、二卷分别为英汉和汉英对照，第三卷为中文的字和词，全书共六百四十六页^⑭。四年之后，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the Rev. Walter Henry Medhurst)编纂了一部四开本的《中文闽语辞典》(A Dictionary of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所收各类词共达一万二千余条，并附有四声发音的范例。在辞典后面附有福建的历史和其他情况的介绍^⑮，这在其他辞典中是罕见的。

在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除了编写大量的宗教小册子外，还出版过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社会风俗和传统文化之类的中文书籍，向中国人民介绍他们闻所未闻的新知识。马礼逊于一八一九年在马六甲出版的一部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和各地人民风俗习惯的著作，名为《西游地球闻见略传》^⑮和《中国大观》^⑯。同年麦都思也在马六甲刊印了《地理便童略传》，分章介绍了中国、亚洲和非洲，还附有四幅地图^⑰以及各大洲的划分、物产、主要国家的宗教状况等。麦都思还在《东西史记和合》一书中，运用中西历史比较的手法，力图论证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同出一源，共为上帝子民^⑱。裨治文也于一八三八年编写了一部介绍美国历史的中文书，取名为《美理哥合省志略》。一八四六年，该书经过修改后刊印，改名为《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一八六二年第三次出版时更书名为《联邦志略》。对于处于奉行严格的闭关政策的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基督教传教士编写和出版的介绍西方国家的书籍，不能说毫无积极作用。它们给先进的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向西方学习，提供了可能和创造了条件。

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远在十世纪，中国人民就发明了活字印刷，并在十三世纪经中亚细亚传入欧洲。对文艺复兴运动起过积极作用的中国印刷术，在西方国家得到迅速的发展。在近代，出现了西方印刷术倒输中国的现象。一八一四年，为印刷马礼逊的《华英辞典》所需，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遣汤姆斯携带印刷机、英文活字及其他机械来华，并由马礼逊和汤姆斯合作制作了一套金属中文活字^⑲。该印刷所定址澳门，取名“爱帕斯印刷所”（the Aypes Printing Office）。该印刷所除负责印刷《华英辞典》外，还出版过马礼逊的《中国大观》、《广东省土话字汇》、《中国杂著》（Chinse Miscellany）和麦都思的《中文闽语辞典》^⑳。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出资的爱帕斯印刷所怕引起清政府的干预，不同意印刷任何带有宗教色彩的书籍。因此，一八二六年马礼逊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购买了一批印刷机械来华，安置在

澳门，取名“爱尔比昂印刷所”(the Albion press)。该印刷所出版了马礼逊主编的不定期刊物《宣教师和中国杂记》(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ous sinica)和一些中英文宗教小册子^②。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建立的最大的使用金属活字印刷的是“布鲁因印刷所”(the Bruin press)。该所之建立是为了出版英文月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机械由纽约布拉克街教会社团(the Bleeker Street Church Society)提供^③，负责人为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该印刷所拥有的金属活字仅中文就有八十箱。据卫三畏称：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④。然而，所有这些印刷所使用的中文金属活字都不是浇铸的，而是在一大块平整的铜板上刻上中文字，然后分别锯开，因此活字不仅粗糙简陋，而且极易损害，每隔五、六年就得重新制作。最早制成的一副浇铸成形的中文活字是在一八三〇年由台约尔(Samuel Dyer)先制成木板模具，然后浇制^⑤。一八三三年，台约尔又浇制了一副型号齐备的中文金属活字，总数约一万四千余个，并用它印刷了《新约》^⑥。以后，上海墨海书馆制作中文金属活字的方法一如台约尔。

中国近代报纸的起点在鸦片战争前数十年间，主持者大都为传教士。第一份中文报是一八一五年八月五日米怜在马六甲编辑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每月一期。为了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该报刊按照线装书的编排和装订方式，采用清朝年号，其宗旨是“兼有传播一般知识和基督教两种作用”^⑦。但是，综观《察世俗》存在之七年历史，宗教色彩十分浓厚，即使偶尔登载介绍自然科学的文章，也掺杂着宗教成分。如该报第三期刊出一篇论述慧星的文章即是如此。米怜在该文结尾处写道：“慧星之显隐，皆在先，神定者，如四时之运行然。这诸情皆真神所预定命而宰督也。世人多理吉凶之兆，所以其心不安定，乃如狂澜之海然。善人不好理吉凶之兆，乃虽见天上地下有奇时，不要怕，只安心，依靠神方着也”^⑧。除《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外，在南洋

地区出版的中文报纸尚有一八二三年麦都思在巴达维亚主编的《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一八二八年英华书院院长吉德(Samnee Kidd)在马六甲主持的《天下新闻》。和《察世俗》与《特选撮要》相比较，《天下新闻》的宗教色彩要淡得多，以报道中国和欧洲各国的消息、刊载历史和科学知识性的文章为主^②。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为《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该报由麦都思、郭士立于一八三三年七月起在广州编辑出版，后移至新加坡，一八三七年停刊。《东西洋考》虽由传教士创办并主持，却以刊载政治、经济和科学文章、报道各国消息和广州贸易行情为主，其中以西方各国政情变化的报道尤为突出。郭士立还考虑到阅读对象“以商贾多矣，是以开洋货单，论生理之财”，特辟一栏，专门介绍广州中外贸易行情^③。《东西洋考》停刊后，麦都思等人遂于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在广州编辑出版了《各国消息》。就其内容而言，大都为外国新闻和货物市价。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各国消息》也宣告结束。

鸦片战争前有多种英文报纸问世。最早和最主要的则均由传教士创办和主持。一八一七年五月，米怜在马六甲编辑了一份季刊《印华杂拾》(the Indo-Chinese Gleaner)。这是由来华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西方读者为对象、以介绍中国为主的近代外文报刊^④。而最有影响的无疑当推裨治文编辑的《中国丛报》。该报从一八三二年五月在广州创刊到一八五二年底停刊，其间长达二十年。《中国丛报》对这一中外关系发生质变时期的诸多方面均有广泛而又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它所保存的有关资料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极大重视。除了报道时事，鼓吹发动侵略战争，叫嚣要打开中国大门以外，《中国丛报》还用百余篇文章，向西方人士介绍中国的文明历史、农业发展、科学技术、历代轶事、语言文学和风俗人情方面的情况。例如，裨治文曾在一篇题为“中国妇女缠脚习俗的起源和影响”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华民族及其家庭风俗中，能找到表明他们违反伦理制度的足够证据。这是邪恶的做

法，不仅人民的思想被歪曲了，而且他们的肌体也弄得畸形了”^①。郭士立撰文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时说：“这部著作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占有毋庸置疑的崇高地位”，并指出，曹雪芹所用的语言是“北方诸省中较高阶级的口头语”^②。《中国丛报》还登载过几篇讨论关于汉字拉丁化表音法的文章，提出各种不同的改革方案，以求“采用一种完善的和统一的表音法作标准，使将来关于中国语言和民族的所有著作都能够得以统一”^③。这不仅对当时西方人学习中文大有裨益，而且对以后汉字拉丁化也不无启迪意义。

(二)

十九世纪初叶正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大肆向东扩张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基督教传教士不论他们抱有何等纯粹的宗教热忱和动机来华，其殖民主义的性质则是确凿无疑的。然而，尽管他们曾多次（特别是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后）鼓吹用武力打开紧闭的中国大门，用刺刀和大炮扫清传教事业发展的障碍，但是毕竟和一八四二年后凭藉不平等条约的庇护，恣意践踏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积极主动参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有所不同。鸦片战争以前由于客观的条件决定传教士的活动重点在文化传教方面，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在沟通中西方互相了解和文化交流方面起某种程度的积极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于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④。

那么，鸦片战争前基督教传士如何“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呢？

首先，传教士把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迅速地传到了西方，使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在马可波罗、利玛窦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传教士在中国及邻近国家的华人社会中居住有年，不象西方商人那样单纯为追求高额利润而来，而是“撰字典，撰杂说”，因此，对中国社会仔细观察，悉心研究，并反映在他们撰写的著作和编辑的报刊上。《中国丛报》、《中国史略》（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郭士立著，1834年伦敦版）、《中国现状和展望》、《中国大观》等有助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特别是和中国保持贸易关系的西方商人对中国的了解。不可否认，传教士的文化活动有“开文学之路，除两地之坑塹”^⑤的作用。

第二、基督教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也为鸦片战争前后先进的中国人了解西方、认识西方和向西方学习提供了必要的知识来源。这一点正如裨治文所指出的：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光采规模，杳无闻见，毫不知海外更有九州”。所以，他“不揣固陋，创为汉字地球图及美理哥合省国合图”，又“以事迹风俗分类略书”，将西方知识“宣而播之”^⑥。鸦片战争之前，自称天朝上国的封建士大夫以“知夷”为耻，“凡涉外域诸书，皆置之一旦”，因此，姚莹称他们为“腐儒”。即使象林则徐那样开明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也搞不清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但是，当侵略者的炮舰出现在广东海面时，林则徐等人从实际斗争的需要开始认识到：“夫制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的重要性了，并感到有必要认真了解那些已经来到中国大门口的西方陌生人。林则徐在抵达广州之后，即组织人员“辗转购得”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在粤出版的书籍报刊“密为译出”，从中了解侵略者的动向。后来他说：“其中所有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⑦。直到被道光皇帝革职之后，林则徐仍主张：“现值防夷吃紧之际，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⑧。传教士介绍西方历史的书也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大开眼界。被魏源推崇的《美理哥合省志略》不仅收入《海国图志》，而且还特加说明：该书“出其本

国，实较原志〔指《四洲志》〕尤提纲挈领”^⑨。他们还从中搞清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粤人称曰花旗国，其实弥利坚，（America）即墨利加，又作美理奇，乃洲名非国名也。西洋称部落曰士迭〔state〕，而弥利坚无国王，止设二十六部头目，另公举一大头目总理之，故名其国育奈〔United〕士迭国”^⑩。

第三，基督教传教士将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和其他知识介绍到东方，促进了中国医药、出版、新闻、教育等项事业的发展。由于传教士来自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本人又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在传播福音的过程，虽然以科学知识的外衣掩盖宗教渗透的本质，但客观上却传播了西方文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十九世纪在上海首屈一指的美华书馆，是传教士在一八四四年创办，一八六〇年迁入上海。它拥有最先进的印刷设备，雇佣工人一百二十六名，除印刷宗教书刊外，还承印学校教科书，前后共发行图书四十万册。美华书馆还垄断上海的印刷业，直至商务印书馆成立。教会学校的设立则将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传入中国，如英华书院、福州的英华中学、上海的裨文女校等，均不同于中国旧式的私塾，而施以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当然还有宗教教育），培养了一批早期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自称中国大门由他的手术刀打开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巴驾（Peter Parker）于一八三五年在广州开设了“眼科医局”（即博济医院前身），前往就医者络绎不绝，既有平民百姓，也有达官贵人，更有跋山涉水来求医者^⑪。巴驾因医求高明，被耆英等人誉为“妙手回春”，“寿世济人”和“慈航普济”的神医。总之，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创办的这些机构和我国以后的医药文化事业不无关系。

第四，为了方便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广泛地接触中国人民，鸦片战争前来华的传教士几乎都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成为西方最早的近代汉学家。居留中国时，他们利用其有关中国的知识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效力。如马礼逊一八〇九年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八一六年和一八三四年分别二次担任英国

政府的阿美士德使团和律劳卑使团的翻译；郭士立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多次航行于中国沿海地区，刺探情报等。他们的著作和评述将中国介绍给西方，从而也推动了各自国家对中国的研究。例如，美国在一八四二年正式成立了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并先后编辑出版了《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美国东方学丛刊》和《美国东方学翻译丛刊》等等。一八三三年来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于一八七六年因病回国，次年在耶鲁大学担任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开始在美国的高等学府开设中国问题的课程和培养美国中国学家。

最后，在鸦片战争前基督教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中，一些中国人曾参与其间，许多译作和著述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努力是不可能搞成的，那些成果是某些中国人和西方传教士共同劳动和创造的结晶。在传教士初至中华，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一些中国人冒着被清政府处死的危险为他们教授中文。如任光明（yü kwan-ming的谐音）、李先生（其名不详）及其子曾担任马礼逊的官话和粤语教师^②。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马礼逊曾得到任光明和罗善〔Low Heen（sam）的谐音〕的协助。他们或帮助马氏翻译《出埃及记》、《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或为马氏的译稿润色^③。一八一〇年，中文《圣经》的第一个单本《使徒行传》之所以能够刊印出版，也得惠于罗善的奔走^④。马礼逊《华英辞典》的编纂也依靠他的中文教师（其名不详）。曾帮助过传教士但而未留其名的中国人更不在少数。这些标志着中外文化交流开端的著作和译述不仅是西方传教士辛勤努力的成果，也包含了许多中国人的聪敏智慧和劳动创造。在传教士创办的各种印刷所里有更多的中国工人，则更是自不待言的。

总而言之，西方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以前对中外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不会被流逝的岁月所泯灭，更何况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东方封建主义统治所起的破坏作用已为历史所证明。

注释:

- ① 古克:《拉福尔士爵士:一八一九年新加坡创建者》1918年伦敦英文版,第167页。
- ② 《中国丛报》,第2卷,第42页。
- ③ 《中国丛报》,第4卷,第99页。
- ④ 米怜:《最初十年中国基督教传教事业回顾》1820年马六甲英文版第35页。
- ⑤ 约翰斯顿:《五十位布道英雄》1913年纽约英文版,第299页。
- ⑥ 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生平 and 事业回忆录》,第2卷,第44页;《伦敦布道会年报》,第39卷,第20页;郭士立:《中国沿海三次行记》第45页;《中国丛报》,第6卷,第97页,第7卷,第548页,第11卷,第178页。
- ⑦ 《中国丛报》,第4卷,第100页;第11卷,第176页。
- ⑧ 唐善德:《马礼逊:中国传教事业的开拓者》纽约英文版,原书无出版年份,第32页;海思波:《马礼逊传》,第28页。该手抄本是在1737年和1738年间根据哈奇逊的要求翻译的,1739年,该书作为礼物赠予英国皇家协会主席斯罗尼爵士,后者又将此书送给大英博物馆。最初这册手抄本是摩西莱牧师的。
- ⑨ 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生平 and 事业回忆录》,第1卷,第221页。
- ⑩ 伟烈亚力:《赴华基督教传教士传略》1867年上海英文版,第5至6页。
- ⑪ 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生平 and 事业回忆》,第1卷,第212页。
- ⑫ 马礼逊:《华英辞典》第1卷,绪言,第9页。
- ⑬ 《中国丛报》,第3卷,第183页;伟烈亚力:《赴华基督教传教士传略》,第8页。
- ⑭ 伟烈亚力:《赴华基督教传教士传略》,第37页。
- ⑮ 同上注,第5页。
- ⑯ 马礼逊:《中国大观》,1817年澳门版;绪言,第1页。马礼逊写道“这部小册子中的材料,最初是计划作为中文辞典附录的”。
- ⑰ 伟烈亚力:《赴华基督教传教士传略》;第27页。
- ⑱ 同上注,第30页。
- ⑲ 麦都思:《中国现状和展望》,1838年波士顿英文版第447页。
- ⑳ 《中国丛报》,第2卷,第7页。
- ㉑ 海思波:《马礼逊传》第177至180页;清洁理:《马礼逊小传》;1935年上海广学会版,第120页。
- ㉒ 布莱奇:《裨治文生平纪事》,1854年纽约英文版,第74页;牛肯:《传教百科全书》,1854年纽约版,第271页;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和书札》,1889年纽约英文版,第78页。
- ㉓ 卫斐列,上引书,第110页。
- ㉔ 《伦敦布道会年报》,第35卷,第28页;第36卷,第25页。
- ㉕ 《中国丛报》,第1卷,第376页。
- ㉖ 米怜:《最初十年中国基督教传教事业回顾》;第138页。
- ㉗ 白瑞华:《中国报纸》,1933年上海英文版,图12。
- ㉘ 白瑞华:前引书,第25页。
- ㉙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月号,序。
- ㉚ 《中国丛报》,第2卷,通告。

- ① 同上注，第3卷，第537页。
- ② 同上注，第266页、273页。
- ③ 同上注，第6卷，第486页。
- ④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49页。
- ⑤ 姚莹：《康輶纪行》，卷十二，叶二十四。
- ⑥ 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志略·序》。见魏源：《海国图志》（一百卷本，清光绪二年平庆刊本），卷五十九，外大西洋，弥利坚总记上，叶四十七。
- ⑦ 梁廷相：《夷氛闻记》，1915年吴县丁南洲铅印本，卷三、叶三十八。
- ⑧ “责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情形片”，载《林则徐集·奏稿》，1965年北京中华版，中册，第765页。
- ⑨ 魏源：《海国图志》，后叙，叶五。
- ⑩ 同上注，卷六十，外大西洋，弥利坚总记中，叶一。
- ⑪ 此人为直隶某县前任知县。
- ⑫ 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生平和事业回忆录》，第1卷，第163和168页；第2卷，第13页；清治理：《马礼逊小传》，第15页。
- ⑬ 唐善德：《马礼逊》第46页；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生平和事业回忆录》，第1卷，第274页。
- ⑭ 《中国丛报》，第3卷，第183页；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生平和事业回忆录》，第1卷，第293页。

论洋务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

• 陈伟芳 •

洋务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两者互相依存而又互相矛盾，构成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课题。本文中提到的早期维新思想和维新派，相当于一般通称的改良主义思想和改良派。由于后者很容易与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混淆在一起，含有贬义，而且这个时期历史实践提出来的问题是维新与守旧的对立，还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出现的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因此，对政治派别及其思想的划分，似应以能反映不同时代的特点为宜。近年来，在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中，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洋务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关系怎样？其地位和作用如何？早期维新思想家是否就是洋务理论家？早期维新思想是否先涵育于洋务思想？这两者能否区别？如何划分？洋务派中有人表露了超越于洋务运动的思想因素，应该怎样理解？这些问题，只有在考察中国近代社会和思想发展的全局中，进行对比研究，才能得到正确的解答。

（一）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举侵入远东，处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和日本同时出现了半殖民地化的危机。新的历史任务摆在两国人民面前：改变封建落后状况，变法维新，改弦易辙，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一般通称的早期维新思想，正是在这个时代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它是东方和西方“两极相逢”的产物。

当时中国和日本都处在封建社会后期，都有激发维新思想的

可能性，但历史实践的结局，两国却迥然不同。

1853年，美国舰队在彼里率领下开入日本江户湾，胁迫德川幕府签订了《神奈川条约》，英、俄等国也接踵而来，同样取得了开放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许多特权。日本朝野震动，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掀起了反对外国侵略和封建压迫的斗争，维新志士奋袂而起，维新思潮迅速形成主流，而于1868年实现了“明治维新”。此后日本大力仿效西方，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又装备和训练新式海陆军，实施义务教育，学习近代科学和文化。改革政治，仿照西洋的政治制度改组中央政府，于1875年成立了参议院，1889年制订了第一部宪法。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只用了约二十年的时间，就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建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中国受到列强侵略比日本早得多，鸦片战争后广大人民群众即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极少数开明官绅和知识分子也在睁眼看世界。但从整体说来，封建统治阶级仍在浑浑噩噩之中，直到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才在“内忧外患”中，惊呼“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从六十年代开始了洋务运动，形成了洋务派。个别先进的知识分子这时也萌发了维新思想，但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才逐步形成一种社会思潮，于1898年爆发了戊戌维新。它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整整迟了三十年，而且很快就失败了。

中日两国强弱之势的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键在于速度。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是两个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运动，前者高速度，后者慢速度。中国在这个时期虽有所前进，但步履蹒跚，徘徊却顾，错过了时机，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终不免于落后挨打。当然，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是多的，不能都归咎于洋务运动的慢速度。

洋务运动的兴起有其历史合理性，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在提倡西学和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的连结点，这都是事实。

但洋务思想与维新思想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是不同范畴的思想体系，前者从属于地主阶级，而后者则从属于资产阶级，由于当时的思想家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能对洋务与维新作出正确的区分。大家都在谈“西学”，讲“时务”，概念都是很笼统的，而语言表达又常互相渗杂，弄得扑朔迷离，难辨雌雄。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史上长期存在。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学者，因为洋务派与早期维新派在思想上有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觉得难于划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或者把前者说成是实践家，后者是理论家。这实际上是以洋务作为时代的中心，把一切都围绕着它打转了。要把两者区别开来，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关键在于抓住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本质，从主导思想及其发展变化中，找出分野来。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及其实践划分为四个序列：一是学习西方造船制炮、军事技术，举办军火工业，训练新式军队。二是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建官办、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交通运输业。贯串在这两个序列中的，还有学习外国语文和自然科学等方面。三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制度，提倡发展中国民间资本主义经济。四是学习西方的政治理论和制度，特别是民权学说和议会政治，主张用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去改革封建专制制度。根据上述四个序列的划分，大致可以这样说，洋务派学习西方是低档次的，对于第一、第二两个序列采积极态度，倡先推行，但对第三、第四个序列则基本上是怀疑或排斥的。维新派学习西方是高档次的，不但对前两个序列中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机器工业等表示赞同，而且进至后两个序列中学习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及其理论学说，力求改革中国封建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只要我们善于从学习西方的四个序列中，综合考察其主导思想和倾向性，并且抓住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两个关键问题（史学界早有类似看法而表述不同），就可以找出洋务思想与维新思想的分界线。这就是：一、是否主张和扶植民间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因为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总是在民营企业大量创办的基础上，从自由竞争中获得活力的。尽管有些洋务派也讲过一两句关于“民营”的话，但其主导思想和实践都是以官统商。二、是否提倡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去批判和改造封建政治。这是有很大风险的最敏感的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时可能运用中国某些传统政制和民本思想，去附会或融合西方的议会政治和民权学说，概念难免有些含混，但仍体现出其思想中的民主性和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精神。事实上，早期维新派对上述问题还没有作出全面系统的论述，表达时也常有委婉含蓄之处，这应该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去理解。

(二)

洋务运动的兴起比维新运动早得多，因此按照一般规律，洋务思想常被认为应当首先出现，并且涵育了维新思想，这似乎是无可怀疑的结论。但是，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在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首都天京，却异乎寻常地首先闪耀出维新思想的光辉，勾画出一幅建设资本主义的宏伟蓝图，比洋务思想的形成还要早些。其实，洋务思想与维新思想是互相依存而又互相矛盾的，都是在同一个大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维新思想在清王朝的硬壳中难于突破，但在太平天国革命政权下却可以脱颖而出。洋务与维新的开端，都是想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但却有着不同的态度和趋向。范文澜同志曾经说过：“鸦片战争后，除了仇视新法的封建顽固派（以满洲贵族为代表），各阶级阶层对外国资本主义生产力都表示了各种不同的态度与趋向，从洪仁玕《资政新篇》提出广泛采用西法到洋务派的把持新工业，基本上都是欢迎蒸汽机，只是趋向各有不同而已”。又说《资政新篇》“有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倾向”^②。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我认为，洪仁玕所代表的趋向是导至维新之路的，其中心思想是：学习欧美各国富强之道，不但要采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而且还要仿效资本